江花周刊

8 长江日报

2026年11月11日 星期三

主编:周 璐 美编:职文胜

版式:洪菊华 责校:正 杰

文心画意 两不相负

李修文

周翼南先生,以“翼南”之名为文,以“易难”之名作画。“翼南”和“易难”,既互为表里,也相辅相成,道尽了他文画交映的跨界艺术人生。文坛中人,多熟悉他的那支钢笔,他以之写沉郁的《愚人船》,写温婉的《珊妹子》,写苍凉的《夜雾消散的时候》,都是湖北文学无法绕过的篇章;画坛中人,多熟悉他的那支画笔,他以之画猫,画门神,画京剧脸谱,画山水花鸟,也皆是湖北水墨界不可多得的佳作。而无论是他的钢笔还是画笔,笔下都深藏着烟火人间,也都流淌着世道人心。

周翼南先生刻有一枚印章——“随心所欲”,这是他的文学观,也是他的绘画观。文学与绘画,在他身上从来都不是两件事,而是同一美学观念的不同创作形式,既融合无间,又彼此渗透。这份让文学与绘画互相滋养的艺术心怀,在文字和线条之间出入无碍的悠游自在,在今天这个越来越细分的时代尤其值得被珍视,也是在提醒我们:文艺的疆域从来都比我们想象的要辽阔。

本次展览以“文字与色彩的共生”为理念,展出了周翼南先生的文学天地和绘画世界,这些著作、画作、实物、手稿、书信等等,不仅呈现了一位文艺家的个体创作轨迹,更折射出湖北现当代文艺历程的一个侧影。文心画意,两不相负,周翼南先生做到了,这场展览,既是向一位文坛艺苑大家致敬,也是对一种文艺创作态度的重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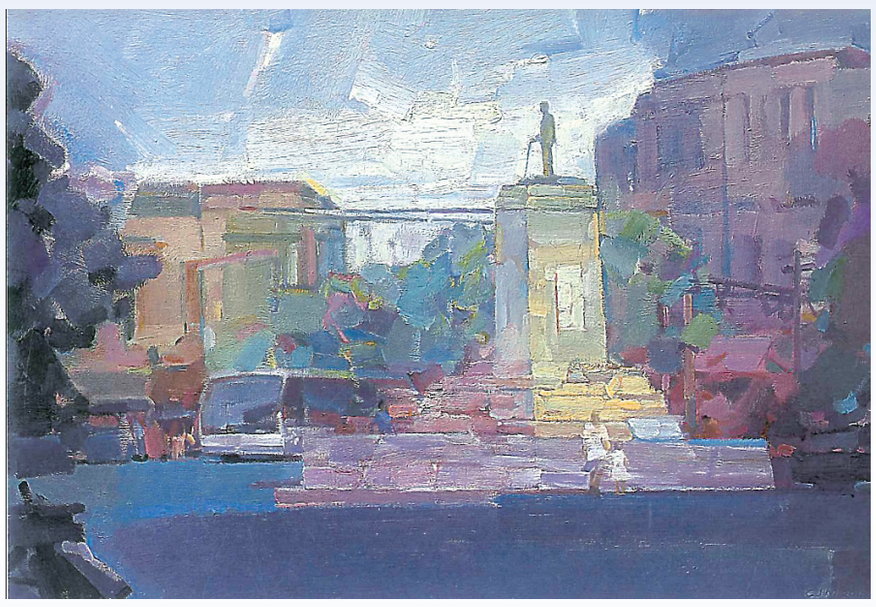
“文墨双翼——周翼南的跨界艺术人生”艺术展正在湖北省图书馆展出,这篇文章为湖北省作协主席、武汉市文联主席李修文为展览撰写的前言。该展览通过百余件著作手稿、名家信札、书画原作及影像文献,全景式呈现湖北武汉知名作家、画家周翼南60余年文学与绘画双轨并进的艺术成就。展览展至11月20日,市民可免费观展。



英雄美人图 周翼南作

先生站在路口

滨彬



敬仰·汉口三民路(油画) 陈建民 作

从汉口三民路走过,我总要抬头看他一眼。

他站在三条马路交会的圆盘中央,身着中山服,右手执杖,左腿向前,目光越过车流,望向中山大道。武汉人不管他叫“孙中山铜像”,只叫“铜人像”。三个字,叫了九十多年,叫成了这方水土的乳名。

一江之隔,武昌阅马场,红楼门前还立着他另一尊像。长袍马褂,右手持礼帽,沉静伫立,像一位刚刚走远又归来的长者。

在这座城市生活了大半辈子,跑了几十年新闻,这两处是我常去的地方。堵车的时候,摇下车窗,他就站在法桐树影里,站在热干面摊子腾起的热气里。

在武汉,他站在路口,陪着这座城市的人早出晚归。

2026年11月12日,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的日子。坐进地铁,穿过头顶上的浩浩长江,我再次踏访。在这两尊铜像前驻足,我在想:一百多年前,他是怎样走进这座城市的?

一

史学界一般认为,孙中山一生两次到武汉。第一次来汉,是1894年。

那年他27岁,还是一名刚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两年的医生。6月,他北上天津,上书李鸿章,洋洋八千余言,石沉大海。南返途中,他曾在武汉登岸,《建国方略》中他回忆1894年与陆皓东北上,“深入武汉,以观长江之形势”。

那是怎样的武汉?龟蛇锁江,三镇鼎立,汉口的码头桅樯如林,洋船的汽笛压过江涛。张之洞督鄂已有数年,汉阳铁厂刚刚出铁,一支按西法操练的湖北新军正在成形。

年轻的孙文站在江边看到了什么,史料没有记载。只知道同一年秋天,他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,誓词是“驱除鞑虏,恢复中华,创立合众政府”。一个医生,从此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。

此后十余年,他流亡海外,未踏足武汉,可武汉与他的联系,没有断。武昌花园山上,吴禄贞们聚会畅谈革命;武昌的军营里,日知会、文学社、共进会一个接一个成立,刘静庵、孙武、蒋翊武……这些大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革命者,当年硬是把一个个秘密据点联络成一个网络。革命党的火种顺着江水、铁路和书刊,渗进新军的营房。辛亥前夜,武昌城里的革命党人,大半读着他的书。

1911年10月10日夜,工程第八营的枪声打响,士兵们拖出楚望台军械库的枪炮弹药,连夜猛攻湖广总督署。天亮时分,总督瑞澂从后墙挖洞逃走,武昌光复。这就是武昌起义。

十八星旗插上蛇山时,孙中山远在美国。两天后,他从报纸上读到了武昌起义的消息。他没有立即回国,而是绕道欧洲,为即将诞生的共和国争取列强的外交承认与借款。等他回到上海,已是12月25日。诸省代表聚在南京,选他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。

这中间的两个多月,武汉三镇正经历建政以来最惨烈的一战。清军重兵压境,革命军退守汉阳、汉口。黄兴督战,城破之际几欲自尽。革命军与市民死伤枕藉,汉口十里繁华尽付一炬。阳夏保卫战拖住了清军主力,为各省独立赢得了时间。

1912年1月1日,南京,孙中山宣誓就职。在那篇著名的《临时大总统宣言书》里,他写下:“武汉首义,十数行省先后独立。”

翻检文献可以看到,在这句话之前,这场起义多记作“武昌起义”“鄂省起义”。自这篇开国宣言传遍全国,“首义”二字定格了武汉的历史坐标,后世“首义之城”的说法由此生长。今天武汉人挂在嘴边的“首义路”“首义广场”“首义中学”等,追根溯源,都发轫于这一句宣言。

确立“首义”之名后,还有沉甸甸的牵挂。南京临时政府草创、百废待兴,孙中山始终惦记在战火里化为焦土的汉口。1912年2月2日,他令实业部发布《通告汉口商民建筑市场文》;2月8日再令内务部筹划复兴汉口市场,殷殷嘱托:务使首义之区,变为模范之市。山河未定、政府艰危,他仍为千里之外这座饱受兵燹(xiǎn)的城市谋划重建。

这份惦记,三个月后落到了实处。

二

4月9日,午后,一艘军舰泊进了武昌江面。

军舰叫“联鲸号”,4月7日从上海启程,溯江两日,直奔武汉。船上下来的,是刚刚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。随行的有儿子孙科,女儿孙娅、孙婉等。

他本打算南下广东。是副总统黎元洪的一再邀请,让他把武汉定作卸任后考察的第一站。各省都有意请他,他独选了武汉——他要来这座英雄的城市凭吊忠魂,抚慰疮痍,看看这些打响第一枪的人。

那一天武汉的盛况,我在旧报刊的影印件里读过。军舰抵岸,“江岸军乐齐奏,士民讴歌”,出城迎接的各界士民,“不下两万人”。

黎元洪率众在都督府门前脱帽相候,车到,他快步上前,亲手扶孙中山下车。两个被时局推上巅峰的人,四手紧握,步入都督府大厅。

我在红楼会议厅复原现场见过那张著名的合影:孙中山居中而坐,神清气朗,湖北军政各界环立四周。照片摄于4月10日,那一天他的行程,密得让人喘不过气。

上午,他先去巡视楚望台,首义之夜的弹药从这里流向各营。接着,他又去凭吊彭楚藩、刘复基、杨洪胜三烈士的就义处——起义前夜,三位年轻人在这里引颈就戮,头颅曾悬挂在城楼示众。距那场牺牲不过半年,江山已换。

随后在都督府的欢迎会上,他作了题为《共和与自由之真谛》的长篇演说。他讲共和与国民的关系,也坦然讲自己为什么辞去大总统。下午,武昌十三个团体联合开欢迎大会,他以“社会革命”为题再讲一场。傍晚,他登上黄鹄矶,走进奥略楼——湖北士绅为张之洞修建的德政楼。站在楼前,长江在目,龟山、蛇山隔江对峙。

就在那里,面对欢迎的人群,他说出了一句武汉人念叨了一百多年的话:“武(武昌)、阳(汉阳)、夏(汉口)三镇宜连成一片,应在江上建筑大桥,或凿隧道,联络三镇为一市。”

江风猎猎。脚下这座城市,当时还没有长江大桥,过江多靠木船小火轮,风浪一起,两岸往来便受阻隔。他站在楼上看得分明:不把这三镇缝成一体,武汉永远只是三个码头。

4月11日,他在武昌接见湖北各界年轻代表。这些代表中,有不少后来成为各界栋梁,人群里或许还有青年李四光——早年留学日本,此时已是湖北军政府实业骨干,多年以后成为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。随后他渡江去汉阳,视察汉阳铁厂——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——和汉阳兵工厂,厂外就是阳夏之战的旧战场。他叮嘱道:要恢复兵工厂生产,设法筹措经费。他又去凭吊汉阳战场,过汉口,勘查被清军纵火烧毁的街市。断壁残垣间,他驻足良久,满目萧然。

那天下午,汉口各团体联合开欢迎会,商会、民社、武汉报界联合会……一长串名单,足见当年汉口社会元气之盛。

4月12日上午,中国同盟会湖北支部开欢迎会,孙中山等相继演说。在汉期间,他还专程走访报馆。据《民立报》记载,他与报界代表相见时,“众俱鼓掌”。临行前,他发布《答谢武汉各团体布告》,再三向各界致意。当日傍晚,“联鲸号”拔锚离岸。

满打满算,他在武汉只停留四天三夜。

四天三夜里,他凭吊了烈士,慰问了军民,勾勒了三镇连通的蓝图。离开的时候,两岸欢送的人沿江而立。没有人想到,这竟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长时间驻留武汉。

三

告别武汉的孙中山,把这座城市写进他的未来中国图景。

1918年起,他在上海起草《实业计划》,1919年正式刊行,后编入《建国方略》。这部后来被称作“中国近百年来‘野心’最大的一本书”,落墨最多的,是铁路、港口、江河、城市。而在这部书里,武汉占据了相当的篇幅。

他写武汉的定位:“为武汉将来立计划,必须定一规模,略如纽约、伦敦之大。”纽约、伦敦,1919年的武汉人读到这句话,多半会当作梦话。可“大武汉”这个叫了百年的称呼,最早的出处就在这里。

他写武汉的交通:武汉是“沟通大洋计划之顶水点”,是“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”。他规划的全国铁路网里,南京—汉口、西安—汉口……一条条线路向武汉收拢。他说,铁路一旦修成,武汉当为“世界最大都市之一”。

他还谋划汉江航道治理,计划改直汉水口急弯,另在沙市一带开凿运河连通江汉,疏通上游航道、兼顾水力利用。一百年后,汉江航道持续整治、多处水利枢纽梯级建成,人们才惊觉他想得有多远。

他接着写那座桥:“在京汉铁路线,于长江边第一转弯处,应穿一隧道过江底,以联结两岸。更于汉水口以桥或隧道,联络武昌、汉口、汉阳三城为一市。至将来此市扩大,则更有数点可以建桥,或穿隧道。”

他还写困扰武汉千年的水患:整治长江堤岸,填筑汉口龙王庙以下洼地。他甚至想得更远——在长江上游拦河建坝,以水闸堰其水,舟楫得溯流而上,又资水力发电。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提出三峡工程的设想。写到兴奋处,他感慨:“其所以益人民者何等巨大!”

可惜,此后数十年,建桥之议几起几落:1913年,北大的德国教授带着学生来勘测,方案报到北京,石沉大海;1923年的《汉口市政建筑计划书》写明以龟山、蛇山为基架桥,连贯三大铁路;1929年、1935年、1946年,国民政府又三次筹划,三次搁浅。民间渐渐流传一句丧气话:“黄河浑,长江桥,一个浑不清,一个建不了。”龟蛇依旧锁大江。

先生终究没有等到长江大桥通车的一天。1925年3月12日,他在北京逝世,弥留之际口授了那份后来传遍中国的遗嘱。

但他为武汉埋下的伏笔,在他辞世将近两年时,兑现了第一笔。1927年1月1日,国民政府自广州迁汉,在汉口南洋大楼开始办公。武昌、汉口、汉阳三镇合为京兆区,正式定名“武汉”。“三镇合一”,正是他在《建国方略》里构想的城市格局。孙科是这一方案重要的推动者。此前,国内现代建制城市寥寥无几,仅有广州等少数城市先行试水。此番三镇合一设立京兆区,在全国城市建制探索中走在前列。

从此,三镇作为一个整体,以“大武汉”的形象站上历史舞台。

四

先生走了,武汉开始用自己的方式纪念他。

先是立碑建堂。1928年,辛亥首义同人就在武昌蛇山建起“总理孙中山先生纪念碑”与纪念堂。纪念碑后来迁入首义公园,成为省文保单位,与黄鹤楼隔坡相望。一直以来,纪念堂却不见踪迹,人们甚至认为它已毁于抗战。近日,辛亥革命研究中心主任叶先培发来照片证实:纪念堂主体结构尚存,现隐没于黄鹤楼下蛇山南坡。作为武昌区政协委员,他已撰写提案,建议以孙中山诞辰160周年为契机,将纪念堂迁建首义公园,让两处同源纪念建筑重归一处,永续留存。

再说立像。武昌的铜像先立起来。1931年,阅马场北端、红楼南面,先生面对着他念念不忘的首义之城。这年10月10日,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六周年,湖北省各界在阅马场举行隆重的铜像落成揭幕典礼。铜像为全身像,高2.32米。据说,此铜像是根据先生1924年底在天津留影创作。设计者是上海雕塑家江小鹣——那位给徐志摩诗集画过封面的艺术家。选址也讲究:铜像身后是当年的鄂军都督府,脚下是阅马场,前方是首义枪响之处。一个人与一座城要紧的几处坐标,在这里连成了一条线。

汉口这尊,波折就多了。

1929年筹建,当时汉口特别市市长刘文岛主持,财政局长吴国桢拨款,吴国桢的兄长吴国柄专程去上海,请江小鹣设计。铜像在上海铸就,像身高2.15米;像座高4米,麻石从湖南运来。

选址也费过一番周折。起初,工务局想把铜像立在江汉关前;后来市政改造,民族路、民权路与三民路交会处腾出一个直径六十米的大圆圈,汉口人叫“六渡桥磨盘”。1931年,市政会议定夺:就立在这里。

可造化弄人。先是市制变更、刘文岛调离,接着1931年那场滔天大水,汉口沦为泽国,工程戛然而止。铸好的铜像运抵汉口,无处安放,只好寄存在招商局的仓库里。先生铜像,在仓库里存放一年多。

1932年10月,吴国桢接任汉口市长,向各方筹资,12月复工奠基,1933年4月竣工。6月1日上午,铜像在三民、民族、民权三路交会的磨盘上揭幕。

文史专家徐明庭生前曾多次讲述这尊铜像的历史。他当年在附近汉口市立第九小学念书。铜像落成时他就在现场。这位“武汉活字典”晚年还记得那天的场面:“鼓乐喧嚣,鞭炮震天。”瞻仰铜像的群众像潮水一样涌来。铜像揭幕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,还有两名持枪士兵每天在像前站岗。

像座四周的白色石壁上,镌刻着吴国桢撰写的像赞与序。据说,这些碑文一度被水泥覆盖。铜像历经多次维修,先后被公布为武汉市、湖北省文保单位。2019年,市政府参事胡全志先生考证发现,像座碑文虽修复,但内容有错漏。他撰写《参事建议》,建议尽快更正铜像序及赞错漏文字。武汉图书馆馆员王钢先生查阅当年报纸,提供了准确的史料原文。当年10月,错漏碑文得以修正。

铜像立起来之后历经的波折,也一桩桩,刻进了一代代武汉人的记忆。

1938年武汉沦陷,人们都捏一把汗:日军在南京毁过孙中山铜像,会不会对汉口这尊下手?谁知日军始终未动这尊像。有一种说法是,南京毁像激起了全世界华人的愤慨,他们怕再犯众怒。也有老汉口人讲述,1949年武汉解放前夕,一场大火从黄陂街烧到民权路,到了铜人像跟前,火焰竟绕了过去。

日子久了,铜像从纪念物变成了地名。老汉口人约会,不说路口,说“铜人像底下等”。外地人来汉口问路,本地人抬手一指:“顺着铜人像的目光走。”

在三民路采访时,曾有老人告诉我,20世纪60年代中期修缮铜像,有人觉得先生的右手空着不好看,自作主张添了一根拐杖。我听了失笑,又觉得心里一暖。这座城市的人对他的情感,全在这些笨拙的细节里——怕他空着手,怕他淋着雨,怕他在路口站得孤单。这一根“多余”的拐杖,先生一直拄到今天。

五

一座城市纪念一个人,是把他的名字写进自己的日常。

铜人像脚下,民族、民权两条马路与三民路在此交会,向四方延伸;不远处,还有一条民生路。这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汉口最早的现代化道路,路名取自三民主义。江边的中山大道,前身是张之洞拆掉汉口城墙修起的后城马路,1927年改名中山马路,1946年元旦定名中山大道,至今仍是汉口繁华处。

中山公园里,2009年11月12日立起一尊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夫妇双人塑像——以两人1915年的结婚留影为蓝本。据公开报道,这是全国第一座孙中山夫妇双人像。

武昌那边的印记更密:起义军入城的中和门,在先生视察的那一年改名“起义门”。江夏金口的长江边,中山舰打捞出水的地方建起了中山舰博物馆。这艘从护国护法年代走来的军舰,1938年被日机炸沉于此,1997年打捞出水,如今静静地泊在馆里,替他与这座城市日夜相守。

而先生当年的畅想,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一实现。

1957年10月,武汉长江大桥通车。万里长江第一桥,正好架在龟山、蛇山之间——正是他当年设想的方位。京汉、粤汉两条铁路自此贯通为京广线。“一桥飞架南北,天堑变通途。”

2008年12月28日,武汉长江隧道试通车,汽车从江底驶过。九十年前,他写的是“应穿一隧道过江底”。

2012年12月28日,武汉地铁2号线通车,中国第一条穿越长江的地铁。从中山大道走进江汉路,坐上地铁,几分钟就从汉口到了武昌。上下班坐地铁过江,成了武汉人的日常。

今天的武汉,过江通道已有十余条,过江地铁织成了网,高铁从这里放射全国,天河机场航线通达世界。九省通衢,正变成九州通衢。他当年在书里写下的“中国本部铁路系统之中心”,成了这座城市最寻常的现实。

六

红楼里的那张合影,仍静静挂在那里。隔着一百多年的时光,他的目光依然清亮。

馆里的讲解员说,每至清明和首义纪念日,总有市民自发到铜像前献花,不留姓名。在六渡桥的环岛路口,我见过放学的孩子绕着铜像追逐打闹,见过外乡游客举着手机拍照,也见过白发老人仰头看一会儿,什么也不说,慢慢走开。

汉口铜像前的车流一年比一年稠,他站的地方,始终是这座城市最热闹的路口之一。114年前,他从江上走来,在人群的欢呼声里登岸,用四天三夜,把这座城市的过去擦拭了一遍,又把这座城市的未来描画了一遍。然后他登船离去,从此再未回来。

他走的时候,武汉的过江工具是木船;他身后的武汉,把火车开上了长江大桥,把地铁开进了江底。

江声依旧,桥隧如虹。

夜色四合,环岛四周的灯次第亮起来,车流绕着铜像缓缓转圈,一圈,又一圈。

先生站在路口,立在灯影里,还是那副姿势:左腿向前,目光向远。这个姿势,保持93年了,仍在向前。

这座城也是。

本社社址: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金桥大道113号新长江传媒大厦 | 邮政编码:430013 | 长报传媒集团印务分公司承印 |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:027-85888888